

《奇迹·笨小孩》： 商业类型片的现实主义回归

■文/廖媞婧

《奇迹·笨小孩》是文牧野导演继《我不是药神》之后又一部以商业类型片方式探索现实主义叙事范式的实践之作。该片于2022年2月在内地院线上映,票房突破13亿。这部商业类型片能够成为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和建党百年的献礼片,意味着它找到了“十八大以来年轻人深圳这座大城市共同成长”这一宏大命题的解题思路。在春节这个集体叙事的档口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显在表达,影片对小人物的奋斗拼搏的观照有意无意地跨越了现实的框架,转而遵循商业类型片的叙事规则:在精准节拍下完成故事的起承转合;采用通俗性叙事的策略;追求个性化价值表达和大众志趣的平衡。

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历史现实在地域性和时代性上为故事取材提供支撑,强调在影像意义上的纪录性价值。《奇迹·笨小孩》的故事发生地深圳是一座以移民、打工创业和改革开放为关键词的经济特区,电子信息产业是深圳的代表性行业。易烱千玺饰演的景浩是一名普通的手机配件维修者。2013年的深圳正值产业转型阶段,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华强北”的创业者们正在探索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三尺柜台一夜暴富的奇迹不断在“华强北”的各个角落上演。电子元件厂厂长景浩和“奇迹小队”队员的角色汲取了“华强北”个体奋斗者的原型,他们的创业故事是华强北创业者们逆袭人生的缩影,也是深圳民营电子产业崛起的传奇化演绎。

一、传奇叙事中的群像塑造

商业类型片的本质是迎合大众的审美范式,为了谋求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影片必须调动和满足社会当下的集体期待,实现价值询唤的功能。《奇迹·笨小孩》虽然立足现实社会语境,但在叙事上刻意规避了对社会本质复杂性的探讨。导演的本意并不在打穿分化的社会阶层,也不在质询苦难的根源。就像影片的名字一样,“笨小孩”景浩的创业成功之路是“努力就会发生奇迹”的现代成功学范本。景浩和“奇迹小队”的经历是超越观众现实生活逻辑和个体经验的,具有传奇化叙事的色彩。兄妹二人在开篇之初即被从原生家庭关系中剥离开来,身处孤独无援的境地。“拯救家人”的亲情感与“时代拼搏”的宏大主题形成叙事同构,

从而遮蔽了以景浩为代表的个体奋斗者追求事业成功的深层动机。

随着21世纪初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和内地电影工业化的自我革新,被纳入到大众消费体系的电影体现了更强的商品性和娱乐性,第五、六代导演不断地探索如何平衡文艺表达和商业诉求。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导演,也开始摸索艺术性和商业性的融合之道。《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这两部基于现实生活经验的传奇叙事也呈现了去中心化、主体个人化的特征。影片将叙事焦点落在底层人群鲜活的生命个体上,以取代宏大的历史阐述。

《奇迹·笨小孩》以景浩为叙事中心人物,在他的感召下集结而来的“奇迹小队”队员们分别代表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各个切面,这些个体角色的典型性塑造帮助影片完成了对社会议题的触达。养老院残疾退休老兵钟伟的存在提示了社会福利保障的系统性缺失;走在自我维权道路上的黑工厂受害者汪春梅是单亲妈妈的典型画像;网吧“三和大神”刘恒志和张超代表了沉溺于虚拟世界寻找生存价值的迷茫青年;因替人打抱不平而留有案底的拳击手张龙豪隐射刑释人员所面临的社会接纳问题……文牧野在人物角色背景的样本抓取上充分考虑了时代性和现实感,对都市社会弱势群体在历史维度上进行了精确的表征。然而,随着小队成员进入好景工厂开始手机精密零部件的拆卸工作,他们就脱离了个人际遇的生活场景。影片对社会症结的映射被统一设置为“升级打怪”的集体主义互助奋斗模式,对于社会真实议题的淡化和回避使得人物设定的“精准性”透出了几分人工雕琢的意味。回观影片围绕着由主角簇成关系网的人物群像,“奇迹小队”个体角色的生命力被景浩负债救妹、孤注一掷创业的精神力量所削弱,止步于对社会阶层困境某种背景式的群像表达。而影片的主题“逆袭人生、创造奇迹”便成为了压在景浩一个人身上的时代命题。

二、情感叙事的空间意象

与第六代导演不同的是,新生代导演的生长没有背负太多使命,他们对于现实主义关照也不再局限于对影像纪实美学范式的探索以及社会变革的反思和批判,而是转向在史实记录的历史维度中寻找个体生命经验的叙事内核,并且更加留意受众化的电影产业规则。文牧野定位自己为“职业

导演”,强调在注重题材和个人表达的同时也要对得起投资方。职业导演的专业主义实践有其自身的路径:用“技术服务故事”的方式靠近大众审美范式,从真实的社会事件中提取与观众的生活经验产生记忆联结和情感共鸣的空间意象。

在地理空间上,影片中的都市景观以二元对立的形式逐层展开。在城市折叠的褶皱处,日常生活图景蕴藏着资本化和制度化的隐喻意味。杂乱破败的城中村、环境逼仄的出租屋和破旧衰落的养老院,与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大厦、整洁现代的跨国公司写字楼形成鲜明对比,昭示着宏大叙事下底层民众个体命运的卑微和脆弱。在心理空间上,集装箱里的工厂营造了一个温情却又悬浮于现实世界的“小圈子社会”:结婚典礼上小队成员如家人般亲密相处;为汪春梅勇斗恶势力时,老老少少展现了“两肋插刀”的兄弟义气;被驱离工厂后,员工们更是将手机原件带回家中进行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作业。影片的开端始于“负债救妹”的亲情动机,基于地缘关系集结而成的“奇迹小队升级打怪”,合力解决一连串厄机,将线性叙事的剧情推向高潮。以家庭、伙伴为核心的初级群体的情感关系取代了工厂制度下的组织关系,被迁移到“奇迹小队”的集体语境中,形成了充满温情和友爱的情感叙事。

主旋律的商业类型片在高潮情节之后,通常顺延一个仪式感的闭合结尾。在《奇迹·笨小孩》里,阶层矛盾的问题最终由资本出手解决,景浩和他的“奇迹小队”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客户的订单,实现了身份地位的飞跃和苦难人生的自我救赎。以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作结的“大团圆式”结局虽然符合春节合家欢的基调和大众的情感诉求,但难免让人怀疑其程式化的套路刻意遮蔽了阶层分化的根本矛盾,淡化了对于社会现实本应给予的反思和批判。

当我们站在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审视这部影片时可以看到,相较于《金陵桂芹》、《安魂曲》等早期的短片作品,文牧野在深耕“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发生了明显的语态转向。《奇迹·笨小孩》的类型化尝试,是新生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工业化语境中对工业美学的实践。通过回归现实主义题材,与主旋律融合的商业类型片得以对其核心叙事的情感深度和意义深度做出某种回应。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

我国新闻改编类电影的叙事策略及其传播特点

■文/白志涛

我国新闻类改编电影立足现实并超越现实,其内容往往建立在值得学习或反思、且对于当今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重大新闻上,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在人物塑造上,这批影片超越了单一从歌颂英雄主义式的个人情操、或为歌颂而歌颂的拍摄方法,通过新的人物塑造方式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人物。这些有效的叙事策略与传播特点令原本的新闻事件产生了新的时代意义,也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价值观影响。

一、事件叙述上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事件叙述上,新闻改编类电影通常采用现实主义影片的叙述模式,在厚重的现实基础上不断赋予这些新闻事件新的时代意义。在叙事文本的时间方面,大部分新闻改编类电影采用线性的历史时间配合正序事件的排列,在事件的长短、时序、频率方面遵循着现实主义电影的节奏。例如以小岗村村书记沈浩为原型人物拍摄的《第一书记》中,影片的叙事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末小岗村开始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由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跳跃到2004年小岗村新一任党支部书记沈浩上任,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讲述了沈浩给死去的村民披麻戴孝,说服吴切切迁坟腾地;不顾自己受伤,也要和脾气暴躁的村民杨德福搞好关系;在工作之余尽量弥补家庭、为小岗村搭铁路桥争取到了京沪线火车双向停开四十五分钟等内容,以平实朴素的手法展现出了“第一书记”真正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患难、骨肉相连的境界。同时,也有一些在整体范畴中采用非线性时间叙事,但在关键情节上采用闪回手法。例如在根据国内打击假药题材的真人真事改编的《我是植物人》中,从植物人状态中苏醒的惘惘与报社记者刘聪相恋,后来进入了药品生产巨头供货。两人在一起医疗事故追查中发现公司使用的麻醉剂存在安全隐患。惘惘在协助刘聪调查,不断从公司获取资料的过程中也渐渐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身份。此时,导演采用了错位概念,将惘惘自己在成为植物人之前也是制假药的参与者这一事实插入电影,赋予故事以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现在叙事时间与插叙叙事时间之间制造了宽广的跨度。

在事件的排列方面,新闻改编类电影也采用了非戏剧化的现实主义手法,将原型人物与原型事件按照现实发生的方式和顺序娓娓道来。在表现

青岛市的普通市民群像的《寻找微尘》中,编剧在叙事方式上以电台主持人通过报社记者寻找匿名好心人“微尘”为叙事线索,最后不仅找到了署名“微尘”资助女大学生念继续学业的酒店老板,还找到了千千万万传递爱心的普通人“微尘”,令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了“微尘”聚小成多,共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力量。真实可亲的“小人物”群像将出租车司机、银行职员、超市出纳等各种普通的城市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整部影片都引人入胜。

二、人物塑造上的多面性策略

在超越了单一从歌颂英雄主义式的个人情操、或为歌颂而歌颂的拍摄方法之后,我国新闻改编类电影代之以多面性、立体化的描写策略。无论是新时代中立足于改革潮头的榜样人物,抑或和谐社会下的那些勤勤恳恳的普通人,都显得真实可信,容易引起观众的信赖与共情。根据养路工人郭明义的先进事迹改编的影片《郭明义》讲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当代雷锋”、“最美奋斗者”郭明义的故事。影片从郭明义从一个普通养路工的部队时期开始,讲述了他任地方、工厂、家庭中因奉献,不求索取,以实际行动学雷锋做雷锋的故事。尽管郭明义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与理想化的道德目标,但影片并没有过于将其拔高为无瑕的道德偶像,而是将他作为一个真实的、活在观众身边的新世纪的“活雷锋”来塑造。这位优秀模范在生活中偶尔喜欢跟同事斗嘴骂俏,在面对他人以“穷酸”时也只是报以憨厚的一笑。影片将郭明义这种不失天真可爱的普通一面很好地表达了出来,让广大观众看到了雷锋精神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在对模范形象与正面力量的弘扬之外,新闻改编类电影在对普通人、配角与负面情绪的刻画上也突破了旧有的局限,显示出新的艺术活力。在根据汶川巴蜀女孩李月真实经历改编的《绽放天鹄》中,小女孩晶晶从地震的废墟中重新站起,不懈地追求梦想。其中的关键配角——晶晶的父亲李良用一种细腻又隐忍的方式诠释了伟大的父爱。在地震夺走了爱妻与女儿的绝大部分身体之后,李良用一种近乎残酷无情的方式对热爱舞蹈的晶晶下了禁令:“你什么都可以学,就是不可以学舞蹈。”影片展示了在面对生活的困境

时人们的真实反映,在呈现勇敢与坚强、善良与乐观的精神之余,也不忘记关怀那些角落中默默无闻的悲伤。尽管这些悲伤总要被跨越,但影片对它们的短暂关注却令影片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与真实的力量。

三、新闻改编作品的传播方式

新闻改编类电影在媒介属性上是以电影的视听语言“写作”的作品,但其内容又因现实性与社会性具有较大的舆论影响。因此,新闻改编类电影在传播上既要坚持社会责任感,忠于新闻事实,弘扬社会正能量;又要注意将视听手段与新闻事件结合起来,必要时还可以借鉴商业类型片的拍摄方法,获得社会影响与可看性的双重效益。以高群书导演的警匪片《西风烈》为例,影片取材于《南方周刊》的一篇纪实新闻,这篇新闻报道了中国警察一支专门追捕逃犯的小队,他们在六年间抓捕了上千名逃犯,人称“四大名捕”。四人小队由头脑冷静、判断能力极强的队长,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能驾驭各种车辆的超级车手与擅长近身搏斗的大力士组成。这一极具戏剧性的组合令“四大名捕”一直都是国内媒体的关注焦点,也是警匪片导演高群书最感兴趣的素材。他从现实中找到了具有戏剧感与上镜头性的西南地区拍摄,还原了这一传奇故事。

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则走了另一条偏向小空间、小事件的路线,在风格上与《落叶归根》、《三峡好人》等影片更为相像。这部影片将曾经发生在贵州山区里的一个“五兄弟追凶”素材进行了再创作。导演放弃了现实素材中诸如五兄弟配合行动、先抑后扬、与凶手狭路相逢等叙事影片中吸引力的来源,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还原到了真实的场景当中,赋予了影片一种至真至纯的质朴与未经琢磨的粗粗质感。导演放弃了利用画外音阐述剧情发展的方式,反而大量运用了广角镜头和近景镜头来推进影片的叙事,广角镜的变形大大加强了全景式的现实主义感觉;人物近景镜头的连续剪辑则呈现一种纪录片般的风格。许多场景中的镜头甚至不会去跟谁进故事,而是以一种旁观视角“冷眼旁观”。这样风格化的拍摄方式在众多新闻改编类电影中独树一帜,在观众群体中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观众都将本片誉为现实题材的艺术佳作。

(作者系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在读本科)

数字经济时代下红色影视作品中的精准思政研究

■文/傅雅琦

一、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精准思政理念

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了数字信息技术与影视、教育领域的充分融合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多媒体信息平台的发达,信息传播速度和质量达到最大化提升和保障,影视作品在当下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影视内容的社会影响力愈加广泛,正好能够作为当下弘扬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国民思想政治素养教育最有效的载体和平台。这是当下数字经济与影视产业的充分融合,也是影视产业与红色历史、思政教育的充分融合。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高度发达也为精准思政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载体。精准思政理念是在习总书记精准思维指导下提出的思政教育新样态,旨在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精准识别、分析、预测、追踪教育对象的思政需求,实现思政教育的精准育人,提高思政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增强新时代思政工作的科学性。这也是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将思政教育的传统优势与信息技

术深度融合”理念的突出表现。

很长一段时期,红色影视作品都宛如流水线上的产品,产量高但社会反响不高,使得红色影视作品无法发挥出良好思政教育效果。归根到底,相关信息数据滞后且信息库不完善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而当下高度发达的信息数字技术在红色影视剧和教育领域的融入和有效运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通过大数据收集、分析、追踪、定位、精准把握当下社会大众的思想政治需求,让红色影视剧的思政内涵诠释更加丰富、科学,形式更加新颖、与时俱进,符合当代大众对红色精神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便于当代大众理解、认同、践行伟大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当下红色影视作品中的精准思政表达

数字经济时代,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红色影视作品已经能够逐渐走出作品形式内容同质化的困境,作品内容更加生动且触动人心,兼具艺术表现美和现实客观性,在作品的思政表达和剧情逻辑上符合了当代大众思想心理和行为特点,照顾

和关注了当代不同群体的精神需求和价值追求,愈发追求红色影视剧思政表达的针对性、具体性和高效性。因此近些年的红色影视作品总是能够获得不同社会群体的一致认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建党百年之际,涌现了一批优质经典的红色影视作品。比如《觉醒年代》、《大浪淘沙》、《长津湖》、《悬崖之上》、《1921》、《山河岁月》等。这些红色影视作品无论是在影视场景呈现还是作品台词、情感精神诠释、人物形象刻画上都做到了与时俱进,发挥了精准思政教育功能,对不同社会群体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具体的思政教育影响。

以红色电视剧作品《觉醒年代》为例,这部红色影视剧从宏观的革命局势到微观的斗争日常,从毛泽东、李大钊等革命伟人形象刻画到对当时众生百态淋漓尽致的展现,都突破了以往红色影视作品无差别的思政内涵局限性,实现了对当代大众具体针对性的思政教育启示。它以鲜活的主角形象启示青年人要坚定崇高思想政治信仰,要拥有铮铮铁骨;以一群质朴真诚的知识分子形象教导当代知识分子要积极向上,敢于追求真理;以风趣而

富有哲理的台词告诫提醒当代社会大众要保持文化自信,温良而自立自强,自律而有大志向。还有红色电影《长津湖》,在对抗美援朝红色历史的真实呈现基础上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个身軀平凡而灵魂闪耀的中国远征军那可敬的英雄气概和不朽的英雄传奇。但更为突出的一点是,该片在情感诠释上涵盖了亲情、战友兄弟情、爱情等平凡人与生俱来的情感羁绊,在人物形象上展现了青年人、青年人和中年人不同的性格心理思想特征和革命觉悟。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英雄,映射的却是芸芸众生。同样是对当代社会现状和当代大众思想情感的精准把握,是对观众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思政教育启示。

三、红色影视作品的精准思政建设

通过这两个典型的红色影视作品中的精准思政理念表达,我们不难看出,相较以往,当代大众在思想观念上更加追求独立、个性和自由,更关注个人情感和思想建设,习惯于从自身情况出发去思考和行动。因此基于这一大数据分析成果,为进一步深入贯彻精准思政理念,实现我国

当下思政工作的精准育人,充分发挥红色影视作品的思政教育价值,当下红色影视作品的精准思政建设就不能止步于当下初步成果,还应当遵循这一正确方向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思政建设。

一方面,时代和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也在与时俱进,红色影视作品的精准思政建设就需要始终坚持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和信息收集,了解当下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需求和思想心理特点,不断适时调整红色影视作品的思政内涵表达诠释策略。另一方面,坚持在精准思政理念指导下进行红色影视作品的创作。红色影视作品的思政教育对象要具体化,有针对性,无论是当代青少年还是中年人,无论是工薪阶层还是农民工人,都能从影视作品中找到心灵的契合点,得到关于家国情怀、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情感启发、关于理想信念、人生追求的启示。总之,数字经济时代为红色影视作品的精准思政建设提供了最好的发展契机,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尽快提高当下及未来思政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系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中级讲师)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psj@163.com jxps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



广告